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ZHONGXI BIJIAO SHIXUE SHI

中西比較詩學史

曹順慶主編 吳興明副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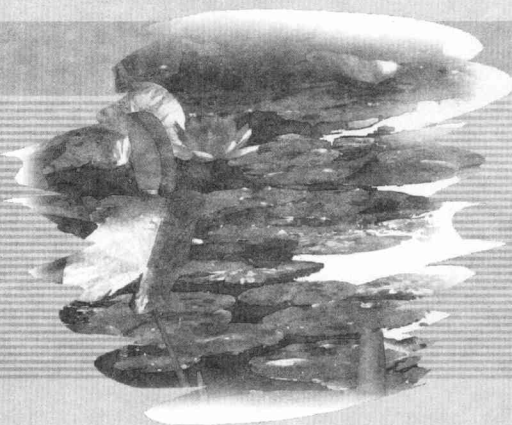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項目

中西比較詩學史



曹順慶 主編
吳興明 副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西比較詩學史 / 曹順慶主編, 吳興明副主編.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8. 6
ISBN 978-7-80752-174-7

I. 中… II. 曹… III. 詩歌史—比較文學—文學
研究—中國、西方國家 IV. I 106.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78016 號

中西比較詩學史

曹順慶 主編
吳興明 副主編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址	www.bsbook.com
發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張	18.625
字數	450 千字
書號	ISBN 978-7-80752-174-7
定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劉文勇 段志洪

秘 書：姜 飛

目 錄

緒 論	(1)
-----	-------

第一章 中西比較詩學的萌芽時期 (1840—1919)	(15)
-----------------------------	--------

第一節 中西比較詩學出場的學科意識背景	(15)
---------------------	--------

第二節 比較意識的確立與中國詩學譜系的轉型——王國維	(32)
----------------------------	--------

第三節 現代性詩學的中國視野——裘廷梁、蔡元培	(47)
-------------------------	--------

第四節 魯迅及其《摩羅詩力說》	(59)
-----------------	--------

第二章 中西比較詩學的前學科時期 (1919—1987)	(70)
------------------------------	--------

第一節 中西比較詩學的早期實踐	(70)
-----------------	--------

第二節 “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草創	(92)
------------------	--------

第三節 梁宗岱的《詩與真》、《詩與真二集》及宗白華的 《美學散步》	(112)
--------------------------------------	---------

第四節 朱光潛及其《詩論》	(130)
---------------	---------

第五節 錢鍾書及其《談藝錄》、《管錐編》	(147)
----------------------	---------

第六節 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	(163)
-------------------	---------

第四節	葉維廉及其比較詩學·····	(389)
第五節	張隆溪、趙毅衡的中西詩學研究·····	(409)
第六章	詩學話語的論爭與中西比較詩學的拓展·····	(425)
第一節	文論失語症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425)
第二節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與跨文明中西比較詩學·····	(440)
第三節	東西方文論的比較及學科意識·····	(454)
第四節	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及其融匯中西文論的努力 ·····	(469)
第五節	楊乃喬《悖立與整合》與余虹《中國文論與 西方詩學》的壑拓·····	(485)
第六節	中西比較詩學的新開拓·····	(502)
第七章	全球化語境中的比較詩學·····	(513)
第一節	多元文化語境中的“和而不同”·····	(513)
第二節	“大同詩學”的討論和質疑·····	(523)
第三節	“輸出東方”與比較詩學的學科努力·····	(533)
第四節	“化中國”與“中國化”·····	(548)
結 語	全球化時代中西比較詩學的另一種承擔·····	(558)
主要參考文獻 ·····		(571)
後 記 ·····		(588)

緒 論

本書是對中西比較詩學史的專題研究。但是，何爲“中西比較詩學史”却是一個需要事先討論的問題。

“中西比較詩學史”的“意指”是什麼？它是指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還是思想史？哪些現象可以納入“中西比較詩學史”的範圍？“比較詩學史”的研究與“比較詩學”的研究在知識品格和知識內涵上有什麼差異？……

顯然，祇有這些問題大體上清楚了，我們纔可能來寫一部《中西比較詩學史》。

一、思想史與學科史

本書的目標是寫一部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

就學科而言，從第一部命名爲《中西比較詩學》（曹順慶，1988）的著作算起，中西比較詩學學科的歷史還不到二十年。以近二十年的比較詩學研究爲重點，側重於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研究，這是本書的基本規劃。顯然，這并不意味着，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沒有中西比較詩學的思想，祇是說，在那之前，中西比較詩學沒有明確的學科建制或以學科建制爲目標的研究視

野，因此，本書選擇了以近二十年學科知識的集結、突破為研究描述的重點。

僅就中國大陸來說，在此之前，中西方詩學之實質性遭遇的歷史就已經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章炳麟的《文學例說》（1901）、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8）、梁啟超的《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這些作為那個起點時代的標志性文獻，顯示了中西比較詩學之遙遠的思想開端。在其後的大半個世紀，朱光潛的《詩論》（1942）、錢鍾書的《談藝錄》（1948）和《管錐編》（1979）、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1983）、宗白華的《美學散步》（1981）等，都是中西比較詩學思想史演進途中的標志性文獻。如果它們可以被看作是中西比較詩學的“史前史”的話，那麼，這個“史前史”無疑是巨大、驚心動魄而又波瀾壯闊的。

事實上，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詩學的歷史景象可以同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一道，被看作是人類思想史、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觀。那些激烈的拿來、植入、變形，那些無聲或有意的替換、壓制和斷裂，那些前仆後繼、永不疲倦的翻譯、介紹的衝擊波，那些不斷追逐、變換的新術語、新思潮、新理論——可以說，在詩學的題域範圍之內，在兩種異質文明的交流融合中，思想上的衝撞激蕩達如此之久，震蕩如此之強烈，受衆面如此之廣大，精神影響如此之深遠，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因此，毫無疑問，廣義的中西比較詩學史要從中國現代思想的開端處算起。

但是，作為學科的中西比較詩學史，我們能否陳述一個沒有學科建制的學科史呢？或者乾脆像許多“放大了”的學科史寫作

那樣，用思想史取代學科史？我們認為不能。思想史固然重要，但學科史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因為思想史和學科史是有巨大的差異的，如果用前者取代後者，會將着力於中西詩學比較的學科意識和知識建制的視野消弭在思想陳述的歷史理解中。作為歷史的思想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是，作為學科的知識則應該有學科知識建構的理解尺度和評價標準。這是兩種不同的歷史考量角度。比如，形象思維問題曾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作為核心話題，影響了大陸中西比較詩學的思想史，但是，它對於作為學科的比較詩學的知識推進很難說有什麼突破性的貢獻。相反，對中西比較詩學方法論的探討，如果放在整個中西文論思想之融合、激蕩的歷史中，也算不上是一個什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但是它對於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具有奠基性的意義。何況，作為學科史的歷史開端事實上是在這門學科明確創立之後。因此，我們要分清思想的歷史和學科知識建制的歷史。或者乾脆說：前者是廣義的中西比較詩學史，後者是狹義的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

本書是側重於對狹義的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史的專題性研究。

二、兩種視閥的交錯制約

但是，思想史和學科史的關係涵蘊還沒有被論述透徹。事實上，這是一個纏繞我們始終的問題：如果前述的基本設想成立，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去處理巨大的思想史和較短的學科史之間的不平衡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立足於學科史，我們看到，中西比較詩學有巨大的思

想背景和歷史傳承。這些傳承之物并不是未經整理的中國傳統詩學和西方詩學的“原始資料”——面對這些資料我們仿佛可以理性化、間距化地去做純對象性的比較研究，而是已經融鑄為整個中國現代思想之中西交融的新傳統。它是活生生的中西比較詩學之學科產生的歷史基礎。這是就思想史對學科的歷史奠基而言。

在這方面其實是有巨大的思想內涵未經清理的。因為祇要還原到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背景中，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到，那是一段非常獨特的歷史：所謂“中西比較”或“在中西之間”，遠不僅僅是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視閾，而是整個中國現代思想的基本處境。“比較”（comparative）對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而言，具有哲學方法論的意義，甚至可以說，內在“比較”的視角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基本視角，它收攝在幾乎所有中國現代思想的創造或轉化之中。如果從“變異學”的角度去考察，面對現代思想史上的幾乎所有理論家的理論和思潮，我們都可以從術語、從觀念、從方法或從材料上找出它們在或西學或中學上的“來源”，而透過對這些“來源”的選擇、變異和整合之研究，我們可以大體上測定這些“思想”的理論方位、流變的脈絡和現實的針對性。所以，中西比較對現代中國而言，是一種思想成型的方式。它內在於中國現代思想的生長機制之中。祇要是從事思想的創造，就總是“在中西思想的邊界上行走”。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人、思想者的命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思想機制的中西比較有別於專門從事跨異質文化現象對比研究的“比較學”。

必須注意的是，對現代中國人來說，那種在中西之間對比、選擇、尋找出路的焦慮所凝聚的，遠遠不祇是一種知識人個體的心理能量，而是一個民族命運的背負。因而，在中國現代詩學的

思想景觀中所展示的，就絕非僅僅是一個知識視野的維度，而且是一個生存選擇的維度。借用海德格爾的話，是一種“生存論”視野的維度。因此，如果說凡“選擇”就必有其“比較”的話，那麼在中西之間的這種“比較”，它的初衷——它的原始涌現、集結和成型倒並不是出於什麼“學科”的興趣，或出於通常意義上的“求知”的興趣，而是對生存意義的重新規劃、探問和尋求。因為這個緣故，中西比較詩學是有其獨特的生存論根據的。它的歷史重量應該和法國學派、美國學派相對純粹的學術動機迥然不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中西比較詩學的思想史作為對比較詩學學科的歷史奠基是一種生存論意義上的奠基，其對民族生存、前途、命運和生存意義的探求、焦慮和關切，已通過這種奠基內在地收納、凝結為漢語世界中西比較詩學學科的基本精神——不明白這一點，就會丟失中西比較詩學在單純學科知識追求背後的精神，也會喪失掉中西比較詩學獨特的學科品格。具體地說，我們就會在歷史的闡釋中無法顯示這門學科的精神內涵和內在的價值涵蘊，無法展示其後的一系列關於中西比較詩學方法論論爭的歷史針對性，比如，關於中國文論失語症的討論，關於“和而不同”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等等。所以，思想史對比較詩學學科的歷史奠基決定了研究學科史必須要有一種關切民族命運的立場意識和歷史精神。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為中西比較實際上關涉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即使僅僅在文藝思想方面，中西之間的交融、會集與現代詩學的歷史也是一個過於宏大的領域。在這裏，由於歷史本身的特殊性，美學史、文論史、文學批評史、藝術思想史和中西比較詩學史等等，實際上是同一的：它們都是在中西思想的交

融、會集和在大體相近的思想題域之中涌現成型的。所以，如果着重於思想史的研究，不僅領域過於廣闊，而且容易使中西比較詩學史的研究淹沒在浩如烟海的文藝思想史的論述之中。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的研究是需要多學科、多角度和多側面展開的工作，中西比較詩學史祇有在明確的學科意識的觀照下纔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參照視角，從而對總體文藝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貢獻。因此，學科意識又不能不是一個規範材料選取和研究展開的邏輯視野。如果說思想史的歷史奠基決定了學科史的研究必須有內在的歷史意識和價值精神，那麼，學科意識的觀照視角則決定了學科史的研究必須要有超越經驗歷史的知識視野和理性反思。

顯然，學科意識是着眼於學科知識的發生、發展及其歷史演進的，它從學科的知識構成和歷史演變來分析歷史。因此，它有另一個學科知識的積累和追求真知的參照坐標。事實上，明確的學科意識及其中立、理性的架構框架一直是中西比較詩學“立學”的根據。祇是因為它立足於對中西比較本身的專題性反思和打量，它纔有理由成為一門學科。在經驗狀態中的中國現代詩學并非沒有“比較”，甚至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化背景中祇要成思成言就一定會有“比較”。但是，這種“比較”大多數是自然發生的，即它對“比較”自身沒有專題性的、有意識的理性的思考和打量。用胡塞爾的話說，它缺乏那種對作為“學科”（比較）立學基礎之邏輯根據的“先驗反思”（在胡塞爾看來，這是所有經驗學科之具有“科學性”的基礎）^①。它是一種“自然狀態”

^① 參見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一章第六節。

中的“比較”，其“比較”的求知意向本身是“前向的”（“經驗性”的）：向着某種具體文論觀點的分析和選擇。而不是“後向的”、反思性的：向着“比較”根據的尋求以及推求在“比較”的架構下知識應該如何去集結。並不是祇要有“比較”就可以成爲一門以“比較”來命名的學科。如果祇要有對中西詩學材料的比較和選擇就是“中西比較詩學”，那麼中西比較詩學這門學科就可以取消。因爲如前所言，如果是這樣，那麼所有中國現代的詩學、文論都是中西比較詩學。正是在這裏，中西比較詩學的學科特質反而消失了。正如關於比較文學的討論所言，“既然什麼都是比較文學，那比較文學就什麼也不是”^①。

所以，思想史和學科史之於中西比較詩學史的研究還不僅僅是重點如何擺放、材料如何選取的問題，它還意味着兩個需要協調的研究視角：一是提供了歷史意識和內在的價值精神，一是提供了學科知識的參照背景和知識追求的反思性視角。對中西比較詩學史的研究而言，兩者缺一不可。

三、“中西比較詩學”的稱名與約定

實際上，還有一個更爲基本的疑慮：“中西比較詩學”這門學科是否成立？如果這門學科都不成立，那麼我們根據什麼來寫中西比較詩學史？這也是一個在本書開始寫作之前必須明確回答的問題。

首先，關於中西比較詩學的合法性。

^① 黃維樑、曹順慶編《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的拓展——臺灣學者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討論一門學科的合法性當然要討論這門學科立學的根據。質疑的聲音一直都有，但是最強有力的表達是余虹教授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余先生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古代沒有“詩學”(poetics)。現代漢語中的“詩學”是從對西文“poetics”的翻譯而來，它的所指是對“文學”的理論研究(theory of literature)，它背靠着西方文化悠久的分類學傳統。中國古代沒有關於“文學”的分類學概念，當然也就沒有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詩學”。古代文論中有“詩學”一語，比如楊載的《詩學正原》、魯九皋的《詩學源流考》，那是指對一種文章體裁的研究。但是，“‘中西比較詩學’的準確意指或確切表達是‘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比較研究’，因此，當這一稱謂用於‘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詩學的比較研究’時，它便暗中斷定中國古代的‘文論’是一種詩學樣式了”^①。

由於中國古代並無詩學，所以“中西比較詩學”不合法。這是一種嚴重的基於語詞表面的相似性而設定的“比較”，它不僅掩蓋和抹殺了中西之間“兩種文化體系的結構性差異”，而且獨斷性地假定了西方的“詩學”是一種超歷史、超文化的“普遍性知識樣式”。因此，問題的實質還在於：在“中西比較詩學”的命名中隱含着一種“隱秘的西方中心主義邏輯”^②……

余先生的分析對於釐清“詩學何為”當然是有建設意義的。但是反過來看，問題又不是像余先生所描述的那樣簡單。比如，我們會問，中國古代沒有“詩學”的學科建制就一定沒有關於

① 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頁。

② 同上，第4頁。

詩、詩意、詩性的思想嗎？就正如我們會問，古代沒有“文學”的分類學概念是否就沒有文學？人生、語言乃至世界的詩性之維是不是一定要有西學式學科體系的分類性建構纔能够思考呢？就算中國古代的詩論可以被歸入一種狹義的詩歌文體論，它對詩意、境界、性靈，對天、地、人、道等等的領會和洞穿是不是就一定止於一種文章體裁論的道說？詩學的核心顯然還不在於是否有形式上學科體系的分類學建制，而是在於它所關切的是不是關乎人生的詩意或詩性之思。嚴格按照余先生的標準，其實海德格爾的詩性之思，阿多諾、本雅明、德里達乃至整個德國的浪漫派哲學都不能算是“有詩學”的，那麼，“詩學”豈不是就僅僅剩下語言論的詩學、新批評的詩學和傳統美學規範性學科建制下的“詩學”了？“詩學”不是就僅關乎“知識”而無關乎“精神”了？這樣的“詩學”即便在西方不是也太狹窄了嗎？

所以我們認為，面對中西思想史，確定所謂“詩學史”的研究範圍仍然要分清思想史和學科史：前者是廣義的對詩意、詩性思考的歷史，後者是狹義的學科建制即規範性知識建構的歷史。而就效果歷史而言，無論是對中還是西，都很難說是學科史的意義重於思想史，還是思想史的意義大於學科史。它們各有自己不同的意義。就當代的情形而言，在國內，現代知識的規範性學科建制固然還需要推進和完善，但是在西方——余先生當然是知道的，狹義學科的知識規範其實早已經讓位於“大理論書寫”^①。尤其對文學性的思考，早已經不是那個學科界域內的“theory of

① 參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

literature”了。在此種情況下，作為跨文明比較研究的“中西比較詩學”還能夠固守那個美學背景下的學科界限嗎？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在作為人文學的現代西學系統解體、而新的系統還有待建立甚至無法建立的時代，我們討論問題仍然是要有題域劃分或問題域分梳的，那麼，我們如果不用“詩學”來指涉這些關於詩性的研究和思考，又用什麼來指涉呢？用“詩學”不好，用“文藝學”就更好嗎？面對不同文明的歷史，“詩學”的稱名當然可以勾銷，但是，思想詩性的歷史是勾銷不了的，要指稱這樣一種歷史總得要有一個名稱。而在當前這種歷史情景下，一個稱名的含義擴大或能指與所指之歷史聯繫的鬆動、漂移，又如何纔能夠避免呢？

實際上，詩性之維可能是最難用西學式學科的方式來“研究”的。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詩性，就如同阿多諾所說的用美學的方式去研究藝術。“藝術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正是因為它們以自然和人類不能言說的方式在言說。”^①“藝術體現着精神，這可以說是藝術唯一不變的意義。”^②但是，“美學就像一般的理論學說那樣，如果沒有一種共相或普遍性因素則是無法理解的。這對美學構成這樣一種誘惑：它所強調突出的恰恰是那些一直遭到真正的現代藝術攻擊的變量”^③。“美學所用的表現形式是狹義的思想史方法（narrow-minded history of idea approach），該方法憑其令人可想而知的努力想要把新的事物還原成某種舊的和

① 阿多諾《美學理論》，王柯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② 同上，第570頁。

③ 同上，第570頁。